

The Thought of “Grasping Things to Know” Promotes the Rise of a New Culture in China’s Smart Education

Yao Luo

Tianjin Industrial Vocational College, Tianjin, 300400, China

Abstract

The new culture of smart education in China is born and developed in response to the tim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To cultivate and develop an innovative culture of building a country for the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alway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omoting the source, deeply rooted i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as, and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of smart education in the er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lobal cultural light of “wisdom”. The idea of “seeking knowledge from different things” is a culmin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ideology. It is a model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thought in China and a recognized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by the people, proven by Chinese historical practice. It shares the same principles and is qualitatively compatible with Marxist ideology, and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and construct a beneficial mechanism for the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wisdom” between thought, education, and culture through the idea of “seeking knowledge from things”. It explores the core practical path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culture of smart education through the idea of “seeking knowledge from things”: the “grid” of thinking is rooted in wisdom, the “grid” of thinking is rooted in wisdom, the “grid” of qi is rooted in wisdom, and the “grid” of qi is connected with wisdom, and the “grid” of training is skillful, Being true to the ‘heart’.

Keywords

Grasping things to know; New culture of smart educ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Li Qi theory; Cardiology

“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崛起之方兴

罗瑶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中国·天津 300400

摘要

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应时而生，应运而发，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培育发展立国为民的创新文化就必须务本兴源一贯始终，厚植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夯时代智慧教育之本，方兴“慧”通全球的文化之光。“格物致知”思想集中国儒家理思哲学于大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典范，是被中国历史实践证明的为人民群众认可的认识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原理相同、质性兼容，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通过“格物致知”思想来认知、探索和搭建思想、教育及文化之间“智”“慧”生成关系的有益机制，探索研究“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发展的核心实践路径：思之“格”以智生而“慧”根，本之“格”以智生而“慧”本，气之“格”以智生而“慧”通以及训“格”有术，正物于“心”。

关键词

格物致知；智慧教育新文化；传统文化；理气论；心学

1 引言

文化关乎国本，关乎国运。适逢百年难遇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伴随着科技融合，创新涌现，思潮迸发之势，新时代中国正携手全人类共享世界观，会邻安邦，倡导新思想，重塑新文化，共谱新篇章。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经历深刻复杂变革，中国的大国形象得以彰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等实践倡导获得国际广泛认同，中国仍然坚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也是促进中国新文化收获国际广泛欢迎，在各领域全面崛起的深层机理，更是中国成为世界先进思想发源地和新文化发展中心的重要标志。^[1]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富含许多优秀的哲思理学智慧，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传承，是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历史实践经验积累的人类思想文化的宝贵财富，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古代哲学认识观和方法论，具有积

【作者简介】罗瑶（1981—），女，在职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从事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科学技术研究。

极地现代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在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建设和发展中,通过深度挖掘古代优秀哲学智慧价值,可以唤醒远古却直达民族思想源头的文化生命,启发中华民族深沉的血脉文化崛起,并结合新时期智慧教育新发展要素实现新文化的崛起方兴。

2 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的源起及由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源远流长,自盘古开天混沌时期,到人猿进化神农石器时代,经尧舜上古鸿蒙开启诸神时期,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由秦汉魏晋南北朝天下一统文化兴,至唐宋元明清古国文明哲思理学开盛世,继新中国改革开放马列主义新理论新思想,穷极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之求索,横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脉络演进,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深厚庞大复杂之历史根源,也是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潜埋的民族文化气节和深谙的厚思尚学内蕴,更是一场中国教育文化跨越时空的蜕变新生。

2.1 空间线—源起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

纵观古今,中国提出“教育”一词早在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源于《孟子·尽心上》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也是战国时期“亚圣”孟子的教育思想观著,这时期的教育雏形初现于后商与先秦的朝代更替时点,正值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过渡,其虽形似当代教育,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然而其内蕴思想却是集大成于儒、道、墨、法、释、名六大流派诸子百家学说之所长,刚柔并济,兼具礼性与哲思,形成我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文化体系之典范,本质内理相异于现代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滋养的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却亦符合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辩证唯物主义,透析出思想、教育与文化之间“为髓、为本、为魂”的深层逻辑关系,生动诠释了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思想道德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历史性转折,自此国家意识的政治思想便可借由教育工具对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趋利避害的有效治理,显化出各色有形的国家文化,形成权力中心的有效德治,与法治相辅驯化人民思想,这也是距今两千年前的教育与今时之教育最为有别之处,即君权专制与人民民主,但不可否认,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是孕育教育文化并可促进教育新文化繁荣的社会正解。

2.2 时间线—由来于数字经济时代

随着人类历史的更迭变迁,全球教育历经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衡量国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国重器,时逢人类频繁遭遇各种全球性灾难和生存危机的严峻时期,全球教育又被暴风式吸入了信息科技大爆炸的数字经济时代,事物演化似乎找到了颠覆人类认知的技术奇点,甚至矛头直戳达尔文“渐进式”

的生物进化论,实现人类社会“跃进式”进化成为了此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抉择和客观宿命,筑于新生产力之上的教育也必然迎来前所未有之机遇与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AR/VR/MR、区块链、人形机器人和脑机接合等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必然导向教育对未来新形态的思考。

“智慧教育”的概念是在2008年由IBM引入智慧地球战略,并在《智慧地球:下一代领导议程》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智慧地球(Smarter Planet)的概念。2012年,祝智庭提出智慧教育的概念和框架,包括为了践行智慧教育的理念,用技术构建“智慧的”学习环境,还要有智慧的教学法,智慧的评估,以培养智慧型人才,即“智慧教育是科学性、技术性、艺术性、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其核心价值是使学生获得美好的学习发展体验。”至此,中国智慧教育正式开启文化育兴的哲思问道之路,以为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高质量持续健康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崛起提供可依可循之客观规律与逻辑机理。

3 “格物致知”是发展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的本源思想

几千年华夏文明沿着炎黄五帝上古神皇血脉,滋养着中国广袤大地,孕育出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忠孝仁义礼智信”之圣贤纲常伦理文化,博大精深的民族内蕴文化凝聚着先贤能者之智慧,也慧达着中华民族的治国理政之根常。先古圣贤说是中国智慧教育文化之兴始,也为后世探索研究教育文化发展新路提供根本遵循和本源志向,鉴史已证圣贤思想非过时之朽论,其强大生命力可贯通古今,循天遁地,亦可幻化于有形万物,启发万物生命之灵,以智达根,慧通至本,以观天下。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承起中华传统文化智慧,中华民族骨髓里先天自带的传统文化思想是扎根中华大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理应依循的本源思想。

3.1 “格物致知”是融合历代先贤智慧的教育认识论

“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是历来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不同时代不同学派都对其进行过释义,最具深远影响的还是当属儒学界的解读。这其中包括,东汉郑玄的注释: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唐朝李翱的注释:“万物所来感受,内心明知昭然不惑。”北宋司马光的注释:抵御外物诱惑,而后知晓德行至道;程颢的注释:穷究事物道理,知性不受外物牵役;程颐的注释: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可见,北宋时期已经对“格物致知”的解读上升到了理与实、物质与精神的科学辩证观。后有南宋朱熹的注释: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陆九渊的注释:修持心性不为物牵,回复天理之知。朱熹首次强调了“格物致知”在教育中的实践方法论,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践反证理论加以深化之。陆九渊则强调在教育研究中应坚持真理原则,上升为精神素养。明朝时期,王阳明的注释:端正事业物境,达致自心良知本体;王艮的注释:规范反省自身行为,了知德行根本。

这时期的思想认知由王阳明进行了内涵扩展,人的道德实践被引入到教育理论中,拓宽了知识领域的泛度,如果说王阳明着重于治学之本心,那么王艮则更关注治国方本,以小见大,阐释个人修身对治国的影响,强调修己的重要性。最后,还有清朝颜元的注释:亲自实践验证,致使知性通达事理。清朝的“格物致知”更多地运用理学于治国理政实践中,将仁政与德政明显区分开,推崇以人为本,则更加跳脱出治学范畴,向上升至德律和治国理论了。

3.2 “格物致知”是探索智慧教育新文化的实践方法论

“格物致知”最早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2]由南宋儒家理学思想代表人物朱熹提出,但由于此书中并未明确揭示其含义,世人只能从其它有关朱熹思想的论著中方得解惑。若论为学之法,朱熹曾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上认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朱子语类》十四)足可见为学尤以为新学而言,“格物”是非常之重要的实践方法,即:至物其极以穷其理。就详实而言,朱熹提出“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致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大学或问》卷一)其认为“格物”须从两方面着手实践,一则训“格”为“至”,“格物”以“至于物”,也即:至物达其极方可“知至”,敏而好学、尚学并时习之,以跬步积万里,广泛涉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知识才能触类旁通,发现万物之本,习得相通,方可以观天下皆文化。“至物”既脉承儒家孔子尊师重教学说又意通现今智慧教育跨学科融合的慎思笃学之风尚,亦可谓博学而瀚渊。二则训“格”为“尽”,“要见尽十分方是格物,既见尽十分便是知止”(《朱子语类》十五)是以“格物”为“知尽”,“知尽”便是“穷理”。[3]即:考究事物之理应全面而详尽,由表及里直至根本,不能取其片面,管中窥豹,一叶障目,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多维视角多层次去演绎逻辑、推理验证,穷尽一切真知灼见探究未知的客观存真,当前发展智慧教育新文化正是需要“格物”的求是精神与实践方法,理实结合,深入实践研究本质,探究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以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方可寻得“致知”大道,复中华文化之方兴。是可谓大道至简,行稳致远。

3.3 “格物致知”是兼容并修发展的哲学世界观

“格物致知”与儒家理学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儒家思想文化的复兴,在先贤重构儒家思想体系过程中,形成了“四书五经”经典体例的独特文本系统,“格物致知”就是系出于四书中的《大学》,其在书中所处排序位于三纲八条目之首位,详细依次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如此严谨的排序考究和一体贯通,足见首纲提领的重要性,也足可鉴证“格物致知”对“治国”、“平天下”的先导意义和指导价值。正因为“格物致知”具有对它思想和它文化强大的兼容并修发展的融合性,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创新理论体系,并对当前发展智慧教育新

文化产生积极地应用价值。

在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读看来,天地万物循“一本之理”,下有“分殊”,“分殊”各有不同,但其理“一本”相通。“至物”“至尽”于“穷理”之后,便可一通百通,习得“一本之理”。朱熹的看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即: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与部分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共通的哲学原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格物致知”传统儒家哲学的兼容并修,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有利于推动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崛起的哲学世界观。

朱熹还认为,“日格一物”可不断“积习”“分殊之理”到“豁然贯通”,学无止境,并非尽学,只要对普遍规律和内在机理积累到一定极值时便可触类旁通,充分论述了对事物认知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发展规律,这也是智慧教育新文化发展过程中,通过多元理论融合不断积累实践经验,以成功探索出可复制的中国模式的哲学真理,这也是可与世界文化兼容并修的方法论和世界观。

4 “格物致知”促进智慧教育新文化发展的核心路径

“格物致知”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理学思想文化精髓,其所示之道理可为天下万物所用,乃世间因循之道,治学之方本,是以为智慧教育新文化发展之理论先导和实践方法。“格物致知”若论治物之理,本领全只在“格物”这两字上了。如何促进智慧教育新文化崛起之方兴,“格物”两字最为要紧,格以何物?何物以格?便是核心路径所要探寻之道理。“格以何物”须要了解智慧教育新文化当下面临何许问题,核心问题,结构机理及内在联系,才能有的放矢,找准“格物”的发力点,以至根本。“何物以格”须要充分结合智慧教育新文化的时代需求和环境资源,整体布局,统筹规划,科学设计,规范架构,高效运用,才能做到“精粗具到,统体兼尽”(钱穆《朱子学提纲》),至内外本末功夫一以贯之,才方可“致知”以达“理通”,最终形成觉知以慧达创新,实现新事物的崛起兴新。

4.1 “格物致知”而生“智”“慧”的关系路径

朱熹“格物致知”解读认为“格物”则须训“格”为“至”、“尽”,以达“极致”,揭示要对事物具象全面观察,综合分析,只有做到表里精粗细致掌握,才可形成对事物系统通透的理论认知体系,方可达“智”。在形成全面理论认知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践求证其间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关联,总结得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得以成“慧”。

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相较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尤其在时代背景、历史使命、文化载体、文化路径、文化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上都较之中国传统教育文化有着更丰富的现代元素和更交融的世界内涵。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经济体系的飞速发展变迁,社会严重失衡的意识形态倾斜,导致传统精神文明固有延续的价值体系濒临空乏甚至崩

塌的边缘,迫切亟需立正树新意识形态,重塑构建与现代物质文明经济体系适衡配位的新生精神文明价值体系,以传承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旨目标与始终追求。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作为新生精神文明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衍生呈现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创新文化,包括网络信息文化、数字文化、泛在学习文化、要素文化、新融合文化、新生态文化、新空间文化、智创文化、新职业文化、新素养文化以及新德育等新兴文化。这些新文化如何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思想观、价值观的正确指引下,因循着中国智慧教育的生长脉络,充分吸收智慧要素,发展为丰富多彩的繁盛之势,就需要以“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搭建有益机制和关联架构,将思想、教育与文化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以思想筑基,教育夯本,文化凝气,践行思之“格”、本之“格”及气之“格”,训“格”为“至”,训“格”为“尽”,以达“致知”,方可“智”生而使之以“慧”根、以“慧”本乃至“慧”通。由此,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便可以“慧”互联,以“慧”互通,以“慧”赢得天下民心。即,“格物”之径也可谓“慧通”之径。

4.2 思之“格”以智生而“慧”根的实践路径

思之“格”,首先要“即物”于思,认识思想的本质,知其与世间万物之联系,区别于文化的本质,研究现代思想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不同思想体系的历史与发展,探索各体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应不同新文化的成因影响等等,才有利于提炼思想理论之精华,去伪存真,扬善惩恶,放之四海皆准,为世界广泛传播。思想,即理论与观点,是归纳与总结,是道化无形,是万法归宗,是客观抽象的存在,属于哲学与科学的范畴。文化,却是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滋味百般的精神食粮,是人类受思想支配在有形世界创造出的具象化的意识形态,是依托生产力要素为载体所幻化的社会气象和众生百态,是国家和民族繁衍生息之“气”。思想是万物之根源,治国理政之根基,而文化乃思想的本源之气,人民的生息之气,更是国家的时运之气。

当前发展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首要任务就是“格”思以“慧”根,就是要不断加强学习,深刻领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反复检验,严谨求证,知尽智生,探索出中国先进思想的兼容并蓄以及支持迁移输出的成功经验及实践方案,以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开放与多元融合,强基“慧”根孕育滋养中国智慧教育怒放的文化之花。

4.3 本之“格”以智生而“慧”本的实践路径

本之“格”,意指要“即物”于本,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本”即为“一”,所谓“万物归一”,教育乃立国之本,国家发展,教育先行。当前,发展智慧教育新文化需要着力

于本之“格”,其因在于传统教育发展凸显出脱离当前新型工业经济发展的滞后性,科技人才供给与公共知识服务能力不能满足新兴产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特别是在5G、大数据、数字化、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脑机接口以及元宇宙等智算信息空间技术创新涌现的领域,还欠缺完善的顶层设计与整体的技术方案,更多还停滞在技术通关与试点应用推进阶段。低成本、个性化、隐私保护、安全可信、开放共享、互联互通以及绿色高效等智慧教育新科技文明和新生态文化还有待全社会乃至全人类协同共建。

中国智慧教育发展至今也才仅仅十余载的光景,却赶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转型,中国教育同时经受着内外环境技术变革的现实挑战,如何重新审视教育,重新定义教育新文化,重塑智慧教育新思想,如何实现理论升级,推动技术融合,如何将科技创新文化与传统教育文化相结合,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这都是摆在当前发展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道路上的艰难课题。教育作为一本之“格”,乃国之重器,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载体,为立国之本,决定着国家的竞争软实力和国际文化影响力,努力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和职普融通的新融合发展模式,积极参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合作及新型工业经济4.0战略,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教育改革开放,促进教育优质公平,实现中华民族教育新文化崛起复兴是“格物致知”的必然路径。

4.4 气之“格”以智生而“慧”通的实践路径

气之“格”,意为“即物”于气,乃文化之气,气是一种蕴含国家和人民精神文明特点的万象之“性”然,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观所具有生命性质的道运变化。朱熹在其理学历史观“理气论”中,也对“气”进行了哲学范畴的解读,并将“理气”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理气”关系构成提出了理学阐释,这与我们对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的“思想—教育—文化”关系构成的观点系出同源,相辅以为证。朱熹的历史观以理气为骨架,以理势为经络,以具体问题为血肉,逐层展开,这是朱熹历史观的重要尺度“理一分殊”。

与此对应,“格物”以致“慧”通,其中“慧”便是指“理势”,“思想”与“文化”则分别意指“理”与“气”。可见,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的关系构成便是以“思想文化”为骨架,以“慧”为经络,“教育”相关问题便是具体的分殊,最终可形成与传统“理气论”相得益彰,且与新时期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发展相适应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理气论”。

依循“理气论”的事分有则,我们便可以更好肃清当前中国纷繁色彩的人民文化生活中的良莠品阶,充分发扬良性文化,警惕遏制毒性文化,将新文化培育创新工作与文化治理工作同时并行开展,在教育文化相关工作中要坚定政治立场,保持高度敏锐性,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思想观、文化观及世界观,扬正气,树新风,促进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慧”

通天下,“气”质化全球。

4.5 训“格”有术,正物于“心”

朱熹“格物致知”理学认识论中对训“格”之术本质体现在“至物”、“穷理”、“积习”以及“一理分殊”之中,这些可以驾驭之“术”不仅包含着朱熹对研究事物的哲学思想和执着精神,还包含着归纳、类推、创造性思维的科学方法,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检验真理的科学精神。朱熹在涉及天文学、地理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除了充分把握当时的科学发展状况,还身体力行积极开展广泛研究,虽然朱熹的科学研究在今时看来多为经验与直观所获,带有臆测推断性质,与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在观察与实验技术上不可同类而语,但是在当时中国古代科学研究背景下看朱熹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是做出了相当有先进价值的理论和实践贡献的,也对新时期发展智慧教育新文化的实践工作很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我们站在科学技术大爆发的新一轮生物本源进化的奇点时代,一切事物都在不可逆转地朝着更高级的生命形态进化发展,人工智能以及类人脑科学技术的超速到来使得传统教育已然拥有了智慧的生命形态,新时代的人类对智慧教育的探索研究则更像是人类对自身生命进化形态的研究。这应该是全部智慧生命都要面对的生存进化,人类亟需促进智慧教育新文化发展的“格物”之术,这个命题不是选择题而是答案肯定的必选题,人类必须深入研究数字经济时代智慧教育新文化的生长趋势,充分了解智慧教育新文化的科技融合路径,超前预判智慧生命多科技投入教育运用的风险防御与安全可控,部署制定数字安全技术法律规范体系和治理机制,建立完善智慧教育新文化的联合创新开发平台和联合体机制,建立完善对智慧教育新文化媒介传播的严格审查机制,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智慧教育新文化发展的益人民属性和正确道德风向,确保智慧教育新文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向,积极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全球智慧教育新文化绿色、安全、开放、共享和可持续的健康良性生态系统,促进科技智慧更好服务人类,让科技与世界为友共展智慧未来。

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训“格”之术主要体现出对于心外事物的训“格”主张,总结得到“理向心外求”的实践方法论。而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集理学思想于大成的哲学家王阳明先生也同样对“格物致知”理论有着独到的认识和见解,阳明先生从朱熹认识论相反的角度提出了“心学”说,这一学说思想大部分记载于《传习录》,并分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个完整的系列论述,阳明“心学”说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人的本心就是天理”,

即:理并不在外在的万物上,而是存在于人的内心,只有透入人心的理才具有最高的精神价值,因此,王阳明“心学”主张的是“理向心内求”,这是与朱熹观点最大的不同之处。此外,阳明“心学”还进一步发展出“格物致知”的“致良知”观点,认为人需要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不断从自身内心出发寻找良知并对良知加以实践的理念。“致良知”发展了“格物致知”的“二分论”,认为“格”字为“正”解,“物”有“物”“事”二分,于“物”而言,理向心外求,“致知”以实学达慧,于“事”而言,理向心内求,“致知”以心学致良知,最终,“物”与“事”都需要“良知”通过“知行合一”的实践来“正心”、“正念”、“正物”。

王阳明“心学”虽然是以批判朱熹观点的形式自成一派,但从整体论角度来看,却是从不同社会层面以及不同社会问题方面对“格物致知”思想进行了有益补充,使得我们当前在发展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的实践中有了更多可供参考的选择。王阳明“心学”有利于“格物致知”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崇道德本体的价值,有效调动价值观和道德观对人类集体意识的建设作用,有利于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发展始终不偏离民心旨向的轨道。“心学”说以政治家的治世角度指导新时期的智慧教育新文化发展的“正物于心”之道,兼具治学处事的均衡融通之术,更是防止智慧教育新文化刻求高深至极,脱离人民生活的御术法宝,相较于朱熹“至物”、“至尽”、“极致穷理”的科学家、学者的治学致知角度,“心学”对知行合一的实践添加了一个道德标尺度量,即良知,使得由此理论而发展的智慧教育新文化会更加亲仁,更加易于大众接受,更能得到广泛推广,更能体现仁心所向,更能凝聚民族力量与世界力量。

当前,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的崛起方兴既需要朱熹“格物致知”的科学家、教育家极致探索的精神,深刻研究创新要素与教育本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个中机理,指导我们对未知世界认知的开启和更高层级的社会人格意识的重构,也需要王阳明“心学”以“致良知”的标尺御术智慧教育新文化发展的道德高度,使得学术和仁术精神同时融入智慧教育新文化的价值观,更加有利于中国智慧教育新文化与全世界各国文化交融互促,实现文化强国,文化兴国的新时代伟大愿景。

参考文献

- [1] 王钰鑫.“九个必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遵循[J].广西社会科学.2021(09):39-45.
- [2] 宋春艳.STS视角下宋代理学与湖湘科技文化的交融与发展[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36(05):101-102.
- [3] 赖铁聪.格物求真——山水画写生我见[J].艺术研究.2014(03):48-49.